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凡尔赛—色佛尔体系”的建立和维护 ——1915—1945年英法殖民主义与中东民族主义的博弈

黄民兴 汪志远

(西北大学 区域国别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中东位于二战期间战火连天的欧亚两大战场之间,但却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只有比较小的动荡。其根源要追溯到一战后英法在中东的殖民统治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博弈。一战期间,英法等国开始策划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期间经历了六个主要阶段。英法最终确立了作为委任统治基础的“凡尔赛—色佛尔体系”。在一战后中东各地爆发民族主义起义的背景下,英法根据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三大类型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第一类是委任统治地和埃及,它们经历了“立宪—与宗主国签署条约—加入国联—独立”的政治发展过程。第二类是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的不断流入导致其与阿拉伯人的周期性暴力冲突及委任统治当局多次仲裁的失败。第三类是一些半殖民地和独立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层和阿拉伯半岛。二战期间,英、美、苏和“自由法国”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第一,巩固与土耳其的关系;第二,加强在地中海东部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第三,彻底改变对犹太人移民的态度;第四,镇压伊拉克的“金四方”运动;第五,消灭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维希政权;第六,联合出兵伊朗,警告阿富汗;第七,促成华夫脱党在埃及执政。虽然大战期间中东基本上保持了“和平”,但民族主义与英法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战后英法殖民体系终于走向崩溃。

关键词: “凡尔赛—色佛尔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殖民主义; 中东; 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K10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152/j.cnki.xdxbsk.2025-04-004

202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八十周年。作为长期从事中东史研究的学者,笔者试图在本文中探讨中东在两次大战中的独特地位及其原因和影响。翻开历史书,我们可以发现中东位于欧亚两大战争策源地和二战期间战火连天的欧亚两大海陆战场之间,但中东却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只有比较小的动荡。这种格局对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在二战中的军事行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中的原因和影响也值得深入探讨,尽管国内外的成果已有不少。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本文必须把研究的时间范围前推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样才能全面审视一战后英法在中东建立的殖民体系及其向二战后美苏主导的中东地区的演变过程。

收稿日期: 2025-05-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新编中东国家通史(多卷本)”(LSYZD21021)。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在中东殖民体系的建立

事实上,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到 19 世纪的“东方问题”,它指“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解体带来的外交问题,主要集中在争夺前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控制权上”^①。牵涉到的主要西方国家是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它们利用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落的时机,对其相继通过外交、战争、经济渗透、煽动民族分离运动、宗教控制等手段进行打压,以获取自身利益。尤其是与奥斯曼帝国接壤的俄国和奥地利,分别通过战争和民族分离运动夺取了奥斯曼帝国大片领土。英法两国则企图保存奥斯曼帝国在西亚的领土,以制衡俄国。

普法战争后,旨在复仇的法国与俄国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德国。此时英法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发生变化,因为后者开始发展与德国的密切关系。英国于 1882 年把埃及变为保护国,控制了塞浦路斯,还在邻近印度的海湾地区控制当地的酋长国(科威特和特鲁西尔国家);法国则开始吞并除利比亚以外的马格里布地区。由于奥斯曼帝国加入德奥一方卷入一战,英法新战略是彻底肢解奥斯曼帝国,并与俄国协调。

一战期间,英法俄三国开始策划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尤其是阿拉伯地区,同时英国秘密地与汉志谢里夫^②及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展开协商,到战后最终形成有关的条约体系。这一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五个主要阶段。

(一) 协约国之间协调立场的密约及英国与汉志谢里夫的协商(1915 年年初—1916 年 3 月)

最早开始的是英国与汉志谢里夫的协商,目的是避免中东的阿拉伯人受到奥斯曼帝国“圣战”的影响,同时利用他们开展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1915 年 7 月 14 日,汉志谢里夫侯赛因(Hussein ibn Ali)致信英国驻开罗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爵士,由此开始了著名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一直延续到 1916 年 3 月。在通信谈判过程中,英国拒不承认侯赛因对阿拉伯半岛以外的要求。直到英法联军在海峡、加利波利半岛及英军在伊拉克相继受挫后,同年 10 月 24 日,麦克马洪才以模棱两可的措辞表示英国承认和支持谢里夫的独立要求,但要求梅尔辛^③和亚历山大勒塔地区及现代黎巴嫩不包括在内,并强调英国在巴格达和巴士拉的利益需要特别考虑,因此双方并没有达成明确的协议。

在此期间,协约国围绕着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和参战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1915 年 3 月至 4 月,俄英法三国经过多轮商谈签署了《君士坦丁堡协定》。协议承诺把伊斯坦布尔及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半岛沿岸的部分土地给予俄国,但伊斯坦布尔将成为自由港,而俄国同意英法在奥斯曼帝国中东地区的领土瓜分计划。1915 年 4 月,英法俄意四国又秘密签订了《伦敦条约》,意大利承诺加入协约国作战,由此可在战后占领巴尔干半岛、中欧的部分领土、爱琴海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及德国在东北非的一些殖民地。

但两个协定没有产生实际影响,因为 1917 年俄国退出战争后,《君士坦丁堡协定》自动失效,而英法在《伦敦条约》中的承诺更多为空头支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后来也不支持条约,于是,巴黎和会废止了该条约。本身并非协议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对英国来说也“不过是个权宜之计,而不属于什么长期战略”^{[1]533-534},最终落空是事所必然。

除了以上涉及多边的条约外,英国还于 1915 年 12 月与伊本·沙特(Ibn Saud)签订了《英国内志条

① “Eastern Question”,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Eastern-Question>, 点击时间: 2025-02-02.

② 阿拉伯语音译,意为“贵族”。也门国王艾什拉夫·欧麦尔二世(?—1296)在其族谱学名著《朋友礼赠:谱系知识》中用“谢里夫”(Sharif)专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与阿里所生之子哈桑和侯赛因的后裔。16 世纪的麦加统治者阿布·努米将哈桑一脉定称“谢里夫”,侯赛因系则称“赛义德”,但仅限于汉志地区。部分贵族主张只有麦加执政者及其直系可称“谢里夫”,其他地方的阿里后裔统称为“赛义德”。

③ 位于今土耳其西南部的地中海沿岸,邻近亚历山大勒塔地区。

约》,规定沙特政权的外交内政均置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由于伊本·沙特是汉志谢里夫的对手,这一条约的签署也证明了英国外交的两头取巧。

(二) 英法瓜分奥斯曼帝国基本方案的确定(1916年4月—1917年11月)

英法两国是瓜分奥斯曼遗产的主要力量,但双方矛盾重重。英法经过反复的争执和磋商,并与俄国交换意见后,于1916年3月由英国东方问题专家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和法国前贝鲁特总领事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çois Georges-Picot)签订了有关协定。主要内容包括:俄国获得奥斯曼的伊斯坦布尔、达达尼尔海峡沿岸以及安纳托利亚东部与俄国毗连的地区;法国得到西叙利亚和南安纳托利亚;摩苏尔西部由法国统治,东部由法国监督阿拉伯人管理。英国占领波斯湾与法占区之间的地区;合并伊拉克南部,北至巴格达,西到今约旦地区,包括地中海和阿卡及西海岸的一部分。这一地区也分为两部分:南部伊拉克由英国直接统治,其他部分由阿拉伯人管理,英国人控制。巴勒斯坦由国际共管。对于这一协定,有西方学者认为,“即使以当年的标准衡量,这种做法也堪称无耻”^{[2]36}。另一位西方学者则指出“《赛克斯—皮科协定》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还要多。”^{[3]194}

英国之所以对法国作出巨大“让步”,首先是因为法国作为一战中作出巨大牺牲的盟国,英国不得不考虑前者的利益;其次,英国试图利用法国对叙利亚和摩苏尔的控制防堵俄国南下。《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签署为日后两国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西亚遗产奠定了基础。同时,协定对阿拉伯地区的划分与英国许诺给侯赛因的地区是冲突的,所以英法俄对此一直秘而不宣。意大利人获悉《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安排后,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1917年4月,英法意三国签订《圣让—德莫里耶讷协定》,规定法国将获得安纳托利亚的阿达纳省,意大利则将获得半岛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然而,英法两国后来声称协定无效^{[1]590}。

(三) 英法瓜分奥斯曼帝国正式方案的出台及纳入条约体系(1917年11月—1919年1月)

尽管英法在瓜分奥斯曼帝国土地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奥斯曼帝国周边拥有大片殖民地的英国的野心超越了《赛克斯—皮科协定》规定的内容。随着战争的进行,英国军方和政治家日益意识到巴勒斯坦重要的战略价值,因为控制这一地区可以为扼守苏伊士运河的埃及提供战略屏障,并为来自伊拉克、经过外约旦的输油管提供关键的出海口^①。此外,由于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英国允许法国在中东的北面控制叙利亚和黎巴嫩,从而防堵俄国的需要不复存在。为了避免法国人在自己出兵巴勒斯坦后施压,英国人决定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两年前的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还对占领巴勒斯坦犹豫不决^{[2]63}。1917年11月2日,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的《贝尔福宣言》发表,这引起了法国的愤怒。1918年11月,在与奥斯曼帝国实现停火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不顾《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有关规定,下令控制基尔库克的英军北上占领盛产石油的摩苏尔^{[2]75},劳伦斯(T. E. Lawrence)则配合费萨尔(Faysal ibn Husayn)的阿拉伯游击队进攻叙利亚。

随着战争走向结束,瓜分领土的密约也演变为正式的条约了。1918年10月,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签署了《摩德洛斯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奥斯曼帝国向协约国开放海峡及其要塞,协约国可以占领帝国任何战略要地;完全取消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汉志及也门等的行政当局,由此,帝国完全失去了其阿拉伯属地。此前,苏俄于1917年11月24日公布了《赛克斯—皮科协定》,引发了全世界的震惊。

在一战结束之际,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8年1月提出“十四点计划”,试图打破旧殖民主义瓜分领土的传统。该计划主张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其他民族拥有自决权,以及在“自治”的基础上不受干扰地发展。威尔逊强烈反对英国控制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他的呼吁在亚非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1918年

① 英国在一战中充分认识到了石油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伊拉克有世界最大的油田。参见麦克米伦《缔造和平:1919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544页。

11 月,备受压力的英法两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支持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自治。

(四) 作为英法委任统治基础的“凡尔赛—色佛尔体系”的建立(1919 年 1 月—1920 年 8 月)

在世界和地区形势变动的背景下,决定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于 1919 年 1—6 月召开,会议讨论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有关建立国际联盟的主张,“目的”在于维护世界和平,保证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会议通过的《国际联盟盟约》是《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规定战前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属地由英法实施委任统治。这些土地属于“甲类”,发展水平最高,由委任统治国给予行政“指导及援助”。这是对“十四点计划”的某种回应。

巴黎和会期间,美英法意等大国与希腊等国家的首脑及亚美尼亚、犹太人等社团的代表就土耳其本土和奥斯曼帝国属地的分配、有关民族的自决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和幕后交易。和会的结果反映在 1920 年 4 月协约国在意大利圣雷莫召开的会议上。会议批准了对土耳其和约的最终文本,表面上承认新月地带的阿拉伯国家应该获得独立,但同时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授予法国,将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授予英国。法国试图保留自己对巴勒斯坦基督徒的保护权,但是失败了^{[1]585}。

1920 年 8 月,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正式签订《色佛尔条约》,该条约成为处理战后问题的凡尔赛体系的一部分。条约在领土方面作出如下规定:土耳其的部分领土分别割予希腊、亚美尼亚;部分领土属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势力范围;部分领土划给库尔德斯坦,其中靠近叙利亚的西部为法国势力范围,靠近伊拉克的东部为英国势力范围;海峡地区由协约国实行国际共管。原属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领土则主要割予英法两国,建立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委任统治地,汉志独立。

在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般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来描述一战后战胜国通过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建立的新的国际体系。“凡尔赛体系”指战胜国分别与德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奥斯曼帝国五个战败国签署的条约,即《凡尔赛和约》《圣日耳曼条约》《纳依条约》《特里亚农条约》和《色佛尔条约》。过去,学者们在论及一战后英法在中东建立的委任统治体系时,时常使用《赛克斯—皮科协定》来描述,但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如前所述,《赛克斯—皮科协定》并非正式的外交文件,参与签字的只有英法两国,尤其是后来委任统治地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变化。笔者以为,使用“凡尔赛—色佛尔体系”(Versailles-Sèvres system)较为准确,理由如下:第一,中东的委任统治体系是由协约国主持的巴黎和会及其后一系列国际会议的有关讨论和通过的国际条约决定的,参与的有英法美意等大国和相关国家;第二,委任统治的形式是通过国际联盟授权并规定其具体内容、实施和监管;第三,委任统治地的数量、名称、地位和领土范围总体上由上述国际会议和条约决定,尽管在《色佛尔条约》颁布后委任统治地的数量和边界(尤其是巴勒斯坦)、有关土耳其本土的划分发生了变动。可见,《赛克斯—皮科协定》只是英法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基本设想和秘密文件,并非确定地区国际体系的文件,不具备国际法的效力。

(五) “凡尔赛—色佛尔体系”的调整(1920 年 9 月—1923 年 7 月)

当欧洲国家还在就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土地讨价还价之时,英法两国已经开始分别对巴勒斯坦、伊拉克与大叙利亚地区加强实际控制或实施占领。

1920 年 3 月,英国在开罗召开会议,决定修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书的条文。会议结束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在耶路撒冷会见了汉志谢里夫的次子阿卜杜拉(Abdullah ibn Hussein),后者提出有关外约旦(约旦河东岸地区)未来的两个方案:把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合并,由一位阿拉伯国王领导;合并伊拉克和外约旦。英国对两个方案均表示拒绝。丘吉尔提出的方案是在外约旦成立一个公国,由阿卜杜拉统治,而《贝尔福宣言》有关犹太“民族之家”的内容不适用于外约旦。1921 年 3 月,英国在开罗再次召开中东问题专家会议。会议通过一项计划,将英国对伊拉克和外约旦的控制权分别交给哈希姆家族的两位王子,即费萨尔和阿卜杜拉,组建由他们统治的伊拉克王国和外约旦

酋长国。这一计划的目的是主要是安抚哈希姆家族,同时使后者协助委任统治当局在当地尽快确立稳定的秩序^{[4]99}。

英国控制巴勒斯坦的同时,也对法国作出让步,即从叙利亚撤军。1920年7月,法国军队占领了大马士革,赶走费萨尔,叙利亚落入法国殖民统治之下,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遭到沉重打击。如同英国从巴勒斯坦划分出外约旦一样,法国缩小了叙利亚的面积。为拉拢当地的基督徒盟友,法国人把后者在黎巴嫩的边界扩展到贝卡谷地,还移交了提尔、西顿、贝鲁特、的黎波里这些地中海港口。“一个由基督徒统治的国家现在加进来了数千名穆斯林,结果便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宗教与族群关系始终得不到解决,两国也因此纷争不断。”^{[1]561}

另一方面,随着协约国军队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先后占领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土耳其,反抗协约国占领的大规模起义也开始了。1919年10月,在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国会议员群集安卡拉讨论政府未来的政策,最终形成了《土耳其国民公约》。1920年6月,土耳其反抗希腊入侵的武装斗争正式开始。同年4月,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爆发了大规模的阿拉伯人反对英国当局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阿拉伯俱乐部成员抗议英国不兑现允许战后独立的诺言,随后与当地的犹太移民发生流血冲突。6月,伊拉克的民族主义组织要求宣布独立,建立君主立宪制,由麦加谢里夫的儿子担任国王,遭到英国拒绝。于是伊拉克爆发了武装示威,逊尼派和什叶派前所未有地联合了起来。英国人从印度调集援兵,直到1921年初才大体控制了局势。1920年7月,在法军占领大马士革的过程中,叙利亚民族主义武装进行了顽强抵抗。同年8月,叙利亚豪兰省爆发农民起义;1921年的起义波及整个北方,并延续到1924年。1925年7月,叙利亚和黎巴嫩爆发了全国性大起义。直到1927年7月,叙利亚起义才最终失败^①。

中东民族主义最突出的成绩是凯末尔战胜了希腊占领军。1923年7月,经过艰苦的谈判,土耳其与协约国签订了《洛桑条约》。新条约废除了《色佛尔条约》有关土耳其本土的各项内容,同时土耳其放弃了对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属地的所有要求。因此,《洛桑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凡尔赛体系出现了一个缺口,协约国允诺的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独立的条文被扫入了历史的故纸堆。事实上,它们对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是否能够建国深感疑虑,有关的主张既是为了应付美国的威尔逊总统,也体现出英法相互制约的企图^②。《洛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英法对西亚阿拉伯地区的委任统治体系最终在国际法的层面上得到承认以及“凡尔赛—色佛尔体系”的正式建立。

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二战期间英法与中东民族主义的博弈

英国学者尤金·罗根这样描述一战后英国在中东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对中东的控制是不可撼动的。英国部队占领了从埃及到伊拉克的阿拉伯领土,其对波斯湾的控制更是牢不可破。尽管阿拉伯世界很少有人希望受英国人的统治,但无论多不情愿,多数人都满怀敬意地看待自己的殖民领主:英国人高效、神秘、有序、技术先进、军事强大。”^{[3]268}在一战后中东各地爆发反殖民统治起义的背景下,英法两国在中东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确保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稳定,实现各委任统治地政治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5]。对于英国而言,另外一个重要目标是确保地中海和印度洋航线的安全。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中东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对英法两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由此后者根据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不同类型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

① 有关一战后中东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详见[苏]阿·阿·古别尔主编《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论文集)》,万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② 有关主张参见:郭长刚、杜东辉《英国的库尔德斯坦政策探析(1915—1922)》,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麦克米伦《缔造和平:1919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613-617页。

(一) 委任统治地和埃及的独立进程

英法对它们在西亚地区的委任统治地和埃及,采取了一套环环相扣的政策。

首先,对殖民统治的制度进行重大调整。伊拉克被英军占领后,英国政府把“管理英属印度……的这一套机制移植到中东地区管理伊拉克——直接作为领主和统治者,既不能容忍毫无顾忌的投入,也无法接受当地民众的反对”^{[6]343-344}。1920 年伊拉克起义后,这种局面不复存在了,英国驻波斯代理公使珀西·考克斯(Sir Percy Cox)担任伊拉克民政专员。更重要的是,英国在伊拉克和外约旦建立了王国,扶植哈希姆家族成员担任国王,从而把直接统治改为间接统治。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一直实施直接统治,但从 1925 年以后也着手开放党禁,允许本土政党参加议会选举并组织内阁,让出部分内政权。

其次,对民族主义阵营分而治之,即拉拢温和派民族主义者,使其掌握部分政治权力,而压制激进派民族主义者^①。温和派民族主义者包括国王(埃及、伊拉克、外约旦、阿曼)、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如埃及的华夫脱党)或政治势力(伊拉克的谢里夫派军官^②和政治家),他们不但使宗主国可以比较轻松地维持统治,而且大幅度减少了后者的财政负担。在外约旦和伊拉克,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不存在国家,而各地相互抵牾的不同教俗贵族和部落势力,意味着建立一个具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伊拉克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1921 年春,英国改组殖民部,任命了一批同情费萨尔和谢里夫派军官的官员。5 月,英国宣布对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实行大赦。7 月,由英国高级专员领导的伊拉克国务会议“选举”费萨尔为国王。在 7 月底举行的全民公投后,官方宣称 96% 的国民“支持费萨尔”为国王。8 月,在巴格达为费萨尔举行了加冕仪式,哈希姆王朝由此诞生^{[7]178-179}。即便如此,实际上英国当局依然利用了不同的政治军事势力对费萨尔政府和谢里夫派军官进行钳制,从而确保他们执行自己的意图。主要包括大批的英籍顾问、英国驻军、装备精良的亚述人国民军^[8]、忠于英国的部落酋长和地方贵族^③。在叙利亚,法国大力培养阿拉维派军官,从而牵制逊尼派民族主义者。

再次,英法还有一个重要措施稳固其统治,就是制定殖民地的国内法获得国际承认,使殖民政权在殖民地的政治、军事和司法特权得到法律保障,而当局与民族主义的激烈博弈贯穿了有关法律的整个制定和颁布过程。在埃及,1917 年 12 月成立的新祖国党提出了要求英国撤军、建立代议制民主政府等 10 条纲领,遭到英国拒绝。1918 年 1 月,柴鲁尔(Saad Zaghloul)等民族主义活动家向英国高级专员提出《民族要求宪章》,要求英国取消保护制度,承认埃及独立,撤退英军。以柴鲁尔为首的七人代表团(阿拉伯语为“华夫脱”,意即“代表团”)要求前往伦敦同英国政府谈判,再赴巴黎参加和会。在柴鲁尔等多名华夫脱党领袖被捕、埃及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之后,1922 年 2 月,英国宣布埃及为独立国家,但设定了“四点保留条款”,将英国在埃及的交通安全、防御埃及、保护外国人利益以及苏丹回归埃及等核心问题置于英国的权力之下。1923 年,埃及颁布了宪法,确立了埃及的君主立宪政体,立法权由国王和议会分享,华夫脱党通过选举控制了议会。此后,英国当局、王室和民族主义政党围绕着宪法和英埃条约进行了漫长而激烈的斗争。在二战阴云密布的背景下,英国向国王施压,迫使其同意恢复 1923 年宪法,并允许华夫脱党组阁。1936 年 8 月,华夫脱党内阁与英国签订英埃同盟条约。条约承认埃及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支持埃及参加国际联盟;双方确立联盟关系,英国对埃及的军事占领即告终止;在埃及军队能确保运河的通航自由及安全之前,允许英国驻军于苏伊士运河附近地区,但不应以任何方式损害埃及的主

① 有关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温和派和激进派,详见黄民兴《中东民族主义的源流和类型探析》,载肖宪主编《世纪之交看中东》,时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6-147 页。

② 指追随麦加谢里夫的儿子费萨尔、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阿拉伯军官。

③ 有关伊拉克这一时期的社会阶层状况,详见 Hanna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权;终止存在于埃及的领事裁判权。由此,英国在形式上结束了保护制度,埃及实现了独立,而英国通过同盟条约保障了自身的利益和存在。

伊拉克和外约旦这两个委任统治地的情况稍有不同。1922年,费萨尔国王被迫接受了为期20年的《英伊同盟条约》。条约强调了委任统治的大多数条款,如在涉及英国利益的所有问题时,国王必须听从英国顾问的建议,政府各部的英国顾问留任等。条约的通过疏远了国王与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关系,什叶派宗教领袖呼吁抵制立宪会议选举。1924年,伊拉克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组织法和选举法,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设有两院制议会,建立了现代行政机构。1930年,英国工党政府与伊拉克签订了《英伊友好同盟条约》。条约正式结束了委任统治,同时保留了英国的诸多特权,尤其在外交政策方面,英国保留在伊的空军基地,战时英军可以自由使用伊拉克的领土、领海和领空等。1932年,在英国的提议和支持下,伊拉克成为国际联盟成员国,委任统治结束。在外约旦,阿卜杜拉于1928年与英国签署《英国—外约旦条约》。条约规定,外约旦的内政外交均须经英国政府批准或按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指示行事;英国有权在外约旦驻军,并可征召、组织和控制一支武装力量;未经英国同意,埃米尔不得征召、保有武装力量;英国政府每年继续向外约旦提供15万英镑的赠款和借款。条约意味着英国对外约旦的统治合法化。1928年公布的宪法草案规定,外约旦的立法权属于立法会议和埃米尔。1929年,外约旦立法会议批准了《英国—外约旦条约》。

1926年5月,法国制定了一部宪法,允许黎巴嫩独立,建立共和国。根据1927年和1929年的宪法修正案,国会议席依据各教派人口的数量选举产生。上述措施标志着法国在黎巴嫩的重点已转向确保各教派力量的平衡,事实上建立了基于教派的分权体制。在叙利亚,1927年4月,法国同意当地举行立宪议会选举,民族联盟获胜。1928年,议会提出一部宪法草案,要求建立独立的叙利亚共和国,遭到殖民当局反对。1930年3月,法国高级专员蓬索(Henri Ponsot)提出宪法修改稿,1933年提交叙利亚议会讨论后被否决。1936年1月,叙利亚爆发全国性总罢工,法国被迫同叙利亚民族联盟谈判,双方达成了妥协。同年9月,签订《法叙友好援助条约》,规定法国在3年内结束委任统治,承认叙利亚的统一与独立,但法国有权在叙设立军事基地、控制叙利亚军队。叙利亚议会批准了条约,而法国议会迟迟不予批准,并于1939年1月否决了条约^{[9]330-331}。1936年10月,法国与黎巴嫩条约的谈判也开始了,11月签订了为期25年的《法黎友好同盟条约》。条约承认黎巴嫩的独立,法国保证支持黎巴嫩在3年内加入国联;黎巴嫩同意尊重法国和法国国民的利益,允许法国军队不受限制地驻在黎巴嫩。但法国政府同样没有批准条约^{[10]530}。

最后,确定中东新生国家的边界。领土直接涉及国家的地缘利益,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和国家认同价值。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政治真空的出现和阿拉伯半岛的内志地区不存在国家的事实,决定了中东一战后各委任统治地和国家的控制地域及其边界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和调整空间。一战期间,英国就大力调动在本地区的军队,迅速抢占具有重要价值的地域,为后续谈判奠定基础。

影响最大的领土问题是英军控制的摩苏尔地区的归属。土耳其对该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而英国则暂时维持摩苏尔的自治地位。1923年夏,伊拉克政府宣布在库尔德地区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同时许诺任命库尔德人为官员及使用库尔德语,摩苏尔由此结束了其地位未定之状况。法国因为放弃了对摩苏尔的主权要求,在当地运营的土耳其石油公司(后来的伊拉克石油公司)中获得25%的股份作为补偿。1924年9月,英国把摩苏尔问题提交国联仲裁。国联派调查团到摩苏尔进行实地考察后,调查报告建议摩苏尔归属伊拉克。同年12月,国联行政院决议认可了调查团的建议^{[7]187}。1926年7月,土耳其批准了英土伊三国条约,确认了现有的土耳其—伊拉克边界。伊拉克同意在25年内把自己在摩苏尔油田获得的矿区使用费中的10%分给土耳其,摩苏尔问题最终解决。此外,1922年、1932年,伊拉克分别与内志和外约旦划分了边界。1933年,国联划界委员会完成了伊拉克与叙利亚边界的划分工作。

外约旦建国时南方的亚喀巴和马安并非它的领土,而是属于汉志王国,外约旦与叙利亚和沙特的边界也未确定。这一时期,沙特的不断扩张及其对汉志的进攻使英国非常担忧。在英国调解下,1925 年 6 月,汉志和外约旦代表签署协议,把亚喀巴和马安并入外约旦。此后,英国迫使沙特接受了协议,今天的约旦领土基本形成^{[4]111-113}。

在英国控制的海湾地区,各酋长国与内志和伊拉克之间也存在领土纠纷和冲突。1922 年,沙特在英国压力之下与其签订了《乌凯尔条约》。该条约将沙特控制的内志部分地区划给了伊拉克和科威特,同时规定成立两个缓冲区,一个在伊拉克和内志之间,一个在内志和科威特之间(他们在 1942 年改称“中立区”)。根据条约,缓冲区内禁止设立军事据点和巡逻哨所,水井周围禁止构筑工事。1923 年 4 月,英国宣布承认 1913 年其与奥斯曼帝国商定的外圈线是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线,从而把伊拉克的海岸线限制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11-12]。

与法国殖民地有关的领土变动主要是叙利亚的亚历山大勒塔问题^[13]。亚历山大勒塔省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与土耳其接壤,拥有地中海东部的良港亚历山大勒塔港,是一个多族群、多教派的地区,土耳其人是第二多的族群。因此,土耳其对该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1936 年,国联决定派出调查委员会展开实地调查。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主张亚历山大勒塔建立独立政权并选举产生议会;亚历山大勒塔在外交层面上属于叙利亚,国防安全则由土法共同保障;其关税、货币及语言与土耳其一致。1937 年 5 月,国联表决通过了报告,并决定在亚历山大勒塔进行全民公投。此后,法国对土耳其做出了妥协。1938 年 9 月,亚历山大勒塔召开第一届议会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哈塔伊共和国,内阁成员均为土耳其人。1939 年 6 月,法国与土耳其签署法土协定,法国结束对哈塔伊的委任统治,将其移交给土耳其。

(二)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与英国当局和犹太移民的斗争

巴勒斯坦的情况与其他委任统治地差别很大,根本原因在于英国许诺犹太复国主义在这里建立一个“民族之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巴勒斯坦形势演变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在委任统治当局的保护下,越来越多的犹太移民从欧洲源源不断地进入巴勒斯坦,尤其是 1933 年纳粹上台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大量购买土地,建立各种机构如工会、政党、民兵、大学、报刊等,形成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其目的在于不断扩大犹太人的控制地域,最终把阿拉伯人从巴勒斯坦彻底排挤出去。而且,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来自欧洲,其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的态度表现出鲜明的殖民主义立场。这是阿犹两个民族、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两种民族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犹太人在冲突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第二,双方均拥有非正规武装,周期性爆发暴力冲突。1920 年和 1929 年皆爆发了大规模的阿犹冲突,在 1929 年的“西墙事件”中,双方各有数百人伤亡。1936 年,阿拉伯人掀起大罢工,破坏交通,袭击犹太人。1937 年 10 月,英国当局宣布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为非法。同年年底,阿拉伯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并扩大到农村,整个巴勒斯坦陷于瘫痪。但在 1939 年 4 月以后,起义逐渐陷入低潮,最终失败。

第三,委任统治当局明显偏向犹太社团,但为避免双方矛盾激化而危及自身统治,多次尝试仲裁。1922 年,英国发表了《丘吉尔白皮书》,声称委任统治政府继续执行《贝尔福宣言》,但无意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语言或文化消失或使其处于从属地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是“出于一种权利而不是默许”;犹太移民无论如何不能超越国家经济的吸收能力所承受的程度。同时,英国不打算将整个国家改变成为一个犹太民族之家。白皮书还建议成立一个主要由英国官员控制的立法委员会。阿拉伯人抵制了白皮书,犹太复国主义主流派表示接受。1930 年 10 月,英国殖民部发表了《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强调英国对阿犹所承担的义务同等重要并可以协调一致;宣称政府的迫切任务是协助阿拉伯人发展农业,而如果犹太移民活动阻碍了阿拉伯人的就业,则应停止移民。犹太复国主义者激烈地反对 1930 年白皮书。

1937年7月在阿拉伯大起义的高潮中,皮尔调查团公布调查报告,主张把巴勒斯坦划成三部分:占巴勒斯坦总面积1/3的沿海地带和加利利地区为犹太国所有;耶路撒冷以及由此通往地中海的走廊仍由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成立阿拉伯国而且并入外约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均拒绝了皮尔报告^{[14]94-101[15]79,90}。

第四,巴勒斯坦不同于其他委任统治地,没有经历“立宪—与宗主国签署条约—加入国联—独立”的政治发展过程。1922年英国发表的《丘吉尔白皮书》建议成立一个立法委员会,由10名英国官员、8名穆斯林、2名基督徒、2名犹太人代表组成。阿拉伯人认为拟议中的立法委员会组成于己不利。《帕斯菲尔德白皮书》重提成立立法会议事宜。1935年11月,阿拉伯人向委任统治政府提出建立民主政府的要求。一个月后,新任英国高级专员提出成立立法会议的建议,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对,希望等到犹太人口占据多数的时候再实行自治。1936年4月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成立并宣布总罢工,向高级专员提出禁止犹太人移民、不许犹太人购买阿拉伯人土地、成立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民族政府等要求。英国当局予以拒绝。

第五,阿拉伯国家高度关注巴勒斯坦局势,并对英国施加压力。1936年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阿拉伯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运动,伊拉克、沙特和外约旦国王向巴勒斯坦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提出了政治解决建议。1937年召开了一次泛阿拉伯会议,讨论了1936年的巴勒斯坦起义事宜。1938年10月,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在开罗再次召开各国议会会议,会议的主要宗旨之一是“保卫巴勒斯坦”。

第六,欧洲大战即将爆发的前景与阿犹冲突的无法调和迫使英国开始改变政策。1939年5月,英国政府发表新白皮书,规定5年内允许7.5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5年之后将禁止犹太移民进入。阿拉伯人对1939年白皮书并不满意,而犹太人反应更为强烈,他们从此走上反对委任统治当局的道路^{[16]295}。因此,英国在巴勒斯坦最终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三) 其他半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非殖民化过程

这些国家的演变不同于上述两个类型,大体上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伊朗和阿富汗。两国在一战后通过不同方式实现了完全的独立,然而它们与英俄的历史纠葛促成其政府实行“第三国主义”,即重点与英苏以外的德意日美发展关系,从而导致了“轴心国”势力的不断膨胀,两国成为“轴心国”情报人员活动的基地,对英法构成威胁。

第二类是也门、沙特和阿曼。其中也门和沙特基本上是独立的,但与英国的关系十分微妙。也门北部属于奥斯曼帝国,南部则为英国殖民地。1918年,北也门脱离奥斯曼帝国,建立穆塔瓦基利亚王国,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承认也门独立。然而,北也门统一也门的努力使其与英国发生了冲突。1918年底,英国出动军舰炮击荷台达、萨利夫、穆哈等也门的港口城市,并出兵占领帖哈麦的海港和城镇,企图迫使北也门国王叶海亚(Imam Yahya)承认英国对南方统治的合法性。几次谈判破裂后,1928年6月,英国军队在军舰和飞机掩护下向叶海亚占领的南方城镇发起大规模进攻,叶海亚被迫撤离。1934年2月,英国迫使北也门签订为期40年的英也友好互助条约。根据条约,英国承认也门独立,也门同意“暂缓”解决边界问题,但也被正式分割为南北两部分^{[17]139-141}。虽然叶海亚统一也门的努力失败,但其从西北部萨达到中西部帖哈麦地区的统治疆域逐渐确立。

沙特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内志地区,这里不存在国家,主要是部落。然而,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派携手建立了沙特国家,并不断扩展,消灭了亲英的汉志王国。不过,沙特国家的四周都是亲英政权,英国担心沙特的扩张危及他们的稳定。1915年,英国代表和伊本·沙特签订《英国—沙特条约》。英国承认沙特家族对哈萨绿洲和内志地区的统治,但内志的内政外交完全置于英国控制之下;英国每年给伊本·沙特提供6万英镑的经济援助以及部分武器弹药。这一条约标志着内志成为英国的“保护地”。此后,沙特的统一运动进展顺利。1927年1月,伊本·沙特宣布成立汉志、内志及归属地区王国,并自任国王。

英国不得不接受半岛的政治现实,于同年 5 月与伊本·沙特签订了《吉达条约》,承认沙特国家的独立,同时废除了《英国—沙特条约》^{[18]105,114-115}。由此,沙特阿拉伯的建国运动宣告完成。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英国殖民势力侵入阿曼地区后,迫使马斯喀特苏丹接受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1913 年,阿曼内地部落在教长塞利姆·本·拉希德(Imam Salim b. Rashid)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阿曼伊斯兰教长国。经过长达 7 年的战争,1920 年 9 月,英国和马斯喀特苏丹国被迫同阿曼教长国在小镇西卜签订和约,即《西卜条约》,承认教长国独立。阿曼从此分为马斯喀特苏丹国和阿曼教长国两部分。马斯喀特苏丹国经济落后,不得不依赖英国的津贴维持财政,同时英国派遣的“顾问”控制了国家的政治、军事和财政。

第三类是科威特和特鲁西尔诸国。它们是面积有限、经济落后的小酋长国,其中特鲁西尔国家包括巴林、卡塔尔和其他 7 个酋长国(后来的阿联酋)。科威特由于自身重要的战略位置,19 世纪末处于英国、其他欧洲国家和奥斯曼帝国的激烈争夺中。1914 年一战爆发后,当地统治的萨巴赫家族酋长接到了英国政府的公函,宣称科威特酋长国是英国保护下的独立政府。1939 年,科威特正式沦为英国的保护国。特鲁西尔诸国于 19 世纪与英国签署《海上永久休战协定》和其他协定,英国据此获得了对这些酋长国的司法管辖权。19 世纪后期,巴林和卡塔尔先后成为英国的保护国^{[19]125-131}。1892 年,特鲁西尔各国同英国签订条约,同意接受英国的独家保护,不与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发生外交往来。

(四) 两次大战之间中东局势演变的特点

第一,中东在英法的主导下逐步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转变。除伊朗、阿富汗、北也门、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实现完全独立外,从奥斯曼帝国崩溃中分离出了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家,但英法在这些委任统治国家仍然保留了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权。除土耳其通过民族解放战争改变了协约国的瓜分计划外,作为委任统治地的阿拉伯国家基本上是英法殖民主义执行《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后果,由此在中东建立了作为地区秩序的“凡尔赛—色佛尔体系”。上述国家的领土划定也是在英法的影响下完成的。

第二,英法俄意四国参与了对奥斯曼帝国遗产的瓜分,但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在本地区拥有雄厚资源的英国。法国一直陷入一战的欧洲战场而无法脱身,俄国则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退出最终的瓜分计划,意大利对土耳其本土的瓜分图谋因为凯末尔革命战争的胜利而破产。同时,瓜分计划的最终落实经历了复杂过程。当姗姗来迟的法军最终来到预定划分给他们的叙利亚之时,等待他们的是大批英军和得到其支持的阿拉伯游击队^①。一些英国政治家甚至要求剥夺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权利主张。其结果就是两次大战之间英法在中东持续的明争暗斗,流亡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在约旦对叙利亚的法国当局进行骚扰,而法国则对巴勒斯坦日益敌视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支持。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二战后。

第三,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对英法的瓜分计划产生了重大冲击^②。首先,两国尤其是英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色佛尔条约》允许亚美尼亚独立、库尔德人自治,特别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其次,从形式上看,英法被迫通过委任统治的方式对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属地进行统治,在原则上同意在它们达到相应水平后实现独立。

第四,英法在其殖民地通过一系列手段试图建立稳定、低成本的“现代”殖民制度,如建立政党体制、颁

① 当时的法国外交官把阿拉伯领袖费萨尔比喻为英帝国主义的“阿拉伯马嚼子”。见麦克米伦《缔造和平:1919 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版,第 536 页。

② “十四点计划”公布后,甚至赛克斯也认为《赛克斯—皮科协定》已经不合时宜,应当废除。见巴尔《瓜分沙洲:英国、法国与塑造中东的斗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3 页。

布宪法等。同时,英法广泛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手法,包括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把摩苏尔划给伊拉克,造成后者与土耳其的矛盾;伊拉克与科威特的边界划分;沙特与哈希姆家族的伊拉克和外约旦的矛盾等)、国家内部制造矛盾(如拉拢温和派民族主义压制激进派民族主义;利用伊拉克农村部落对抗城市社会等)^①。

第五,西方在中东建立的“民主”制度逐渐衰微。首先,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东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其中的激进分子开始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彻底衰微,不再具有生命力,它在文化传统绝然不同的伊斯兰世界更没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20]83}。其次,埃及和伊拉克等国的议会制政府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并解决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加上政界上层的腐败,这就加深了激进民族主义力量对议会民主的失望^[21]。其后果是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第六,由于本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巨大不平衡,民族主义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民族主义运动最激烈的地区是新月地带(作为委任统治地的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东北非(埃及)与北非地带(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上述三个地区在地理上是相互连接的,而同样在地理上邻近的外约旦和阿拉伯半岛(南北也门、海湾酋长国)几乎不存在民族主义运动,或者只有个别的民族主义运动(阿曼)和旧式的王朝构建(沙特)。

第七,中东复杂的民族和族群状况成为英法与民族主义博弈的重要切入点。显然,致力于完成国家构建的中东国家民族主义(土耳其人、伊朗人、阿富汗人和新月地带的阿拉伯人)成为反对殖民主义的主力,而上述国家中的少数族群(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马龙派、亚述人等)则成为殖民主义大力扶植以对抗国家民族主义的工具。

三、二战期间英法与中东民族主义的较量

(一) 大战的爆发及对中东外围的威胁

1939年,二战的欧洲战场燃起战火后,德国制定了涉及中东地区的大战计划:夺取埃及,沿“三B铁路”进兵伊朗和阿富汗,威胁苏联和英属印度,与日本会师暖洋。1940年8月底,希特勒制定了“边缘战略”,目标分别是西地中海和东地中海;前者指占领直布罗陀和北非,后者指占领苏伊士运河和希腊及克里特岛^{[22]78-79}。同时,德、意之间进行了分工:德国负责对付欧洲大国法英苏及波兰等,意大利负责夺取地中海地区,重建“罗马帝国”。然而,由于苏联战场吸引了德军主力以及在地中海区域西班牙、维希法国和意大利各自的利益无法协调,上述计划未能实现^[22]。

从实际的战争过程看,轴心国的进攻从西面、西北面、北面 and 东面对中东形成严重威胁:西面即北非战场,作战目标是夺取北非、中东和地中海的控制权及英法的殖民地。在1940年7月到1942年10月的阿拉曼战役中,英军粉碎了隆美尔率领的德意联军的攻势。西北面即巴尔干战场,轴心国的作战目标是建立进攻苏联的南方战略基地,保障地中海区域的战役实施。早在1939年4月,意大利即占领了阿尔巴尼亚。1941年4月,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至5月占领两国全部领土,南军和希军先后投降,英国远征军撤出。此外,巴尔干地区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参加了法西斯联盟。北面即苏联战场。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战争,到1942年12月占领了黑海沿岸的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地区,与中东近在咫尺。直到1943年8月库尔斯克会战后,苏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才最终改变了战局。东面即远东战场,对中东构成潜在影响的是缅甸战役,因为缅甸紧邻靠近中东的印度。1942年初,日本入侵缅甸,英

① 著名黎巴嫩裔英国中东史专家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甚至认为,华夫脱党、麦加谢里夫侯赛因等民族主义领导集团并非真正寻求独立,他们仍像奥斯曼帝国时代那样,只是希望“在他(欧洲统治者)和他们之间创造一种新的平衡……他们将作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中介者行事,利用自己的权力使力量平衡向有利于地方利益的方向倾斜”。见 Albert Hourani,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Macmillan, 1981, p. 73.

军和中国远征军失利,缅甸沦陷。直到 1945 年 3 月,中国远征军在美英军队的协同下,最终收复缅北 50 余座城镇,解除了日军对印度的威胁。总之,由于盟军的顽强作战,基本上解除了轴心国在上述方向对中东的威胁(巴尔干除外),总体上保障了中东的安全。

(二) 大战期间中东的动荡

随着欧洲战场大战的开始和轴心国军队的步步进逼,中东地区的形势逐步呈现出紧张的态势,这种态势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维希政权。1940 年 7 月,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建立维希政权,接管了法国的海外殖民地。此前,法国已经在叙利亚恢复了委任当局的直接统治,在黎巴嫩中止了宪法,解散了议会,由法国顾问直接控制政府。而维希政权接管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权后,根据其于德国签订的巴黎停战协定,事实上由意大利主导的德意委员会与法国当局建立了对叙、黎的双头统治^{[23]199-200}。同年 11 月,当茨(Henri Dentz)担任法国高级专员后,与德国的关系公开化,德国的特务涌入叙利亚和黎巴嫩,为德国的控制做准备^{[10]619}。

第二,一些中东国家的政府和精英的亲轴心国倾向。首先是伊朗和阿富汗。在伊朗,政府在大战爆发后宣布中立,而德国商品取道苏联从陆路继续入境。在阿富汗,轴心国积极活动,敦促哈希姆政府参战。德国公使公开扬言,宣称愿意帮助阿富汗复兴杜兰尼帝国,条件是阿支持德国,并对印度西北边境进行骚扰。同时,一些阿富汗高官与德国频频接触,了解德国对阿富汗以参加对英作战为条件从苏联收复失地的态度。大战开始后,埃及的法鲁克(Muhammad Farouk)国王和政府表现出一定的亲德倾向,甚至亲英的沙特也开始发展与纳粹德国的关系。

局势最为严重的是伊拉克。大战爆发后,亲英的谢里夫派领袖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力主履行英伊条约的所有义务,甚至宣战,但在激进派民族主义的反对下让步。此后,激进的泛阿拉伯派政治家与军官联合起来,建立了拉希德政府,与因领导阿拉伯起义而流亡到伊拉克的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Mohammed Amin el-Husseini)建立了一个由伊拉克和叙利亚民族主义领袖组成的阿拉伯委员会,提出一旦苏日意三国加入德方作战,则应在巴勒斯坦发动起义。盟国在战场上的失利,更促使政府派人秘密与德国驻土使馆和德国政府接触,要求德意两国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并提供军火。1941 年 4 月,阿拉伯委员会发动政变,摄政、努里等人逃往国外。激进的泛阿拉伯派最终与温和派决裂,新组建的拉希德政府得到了日意两国的承认,并与德国复交^{[7]203-204}。

在其他一些中东国家,轴心国的胜利受到了当地一些民众的欢迎,他们把这看作最后消除英法殖民统治的绝好时机。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在伊拉克的起义失败后于 1941 年到达德国,试图争取纳粹的实际支持,但未能如愿。埃及以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和萨达特(Mohamed Anwar al-Sadat)为首的进步军官于 1942 年开始酝酿成立自由军官组织,萨达特等人曾与利比亚的意大利人和隆美尔(Erwin Rommel)进行秘密接触。穆斯林兄弟会的部分成员也发动了声援德国的示威,喊出了“前进吧,隆美尔”的口号。

此外,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策略和组织方式对中东民族主义产生了某些影响。埃及的另一个伊斯兰组织“青年埃及”据说获得过意大利的秘密资助,并曾派代表参加纳粹党的纽伦堡会议。它还将自己的名称改为民族主义伊斯兰党^①,建立了欧洲法西斯式的“绿衫”青年运动。为了与之进行抗衡,华夫脱党也建立了“蓝衫军”。

中东的民族主义对轴心国的亲近,其真实用意在于利用对本地区尚未构成威胁的轴心国来对抗英法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非接受法西斯主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兼有遏制其他轴心国的扩张(如

① 此名称模仿纳粹党。“纳粹”即德语“民族社会主义者”一词缩写 Nazi 的音译。

沙特接近德国乃是为了对抗意大利在红海的影响) 或苏联的压力(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 的意图^①。

(三) 英美苏和“自由法国”的应对

第一, 巩固与土耳其的关系。土耳其地跨欧亚大陆, 战略地位重要。早在战前, 英法即努力与其加强关系。1934年9月, 土耳其成为国联非常任理事国。1935年, 西方国家、苏联和土耳其签署了《蒙特勒公约》, 土耳其夺回黑海海峡主权。1937—1938年, 英国向土耳其提供了两笔共计1900万英镑的贷款, 英国的大批专家、工程师来到土耳其参与经济建设。1938年, 法国对土耳其作出重大让步, 解决了后者与叙利亚的亚历山大勒塔争端。1934年初, 在英法支持下, 土耳其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希腊签订了《巴尔干公约》(即“巴尔干协约”), 目的是共同防卫地区安全。1937年, 英国推动土耳其和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四国签订《萨阿达巴德条约》, 组成了“近东协约”集团。1939年4月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后, 英法开始与土耳其紧急磋商, 但英法一直拖到同年10月才最终签订了三国互助条约。而到战火蔓延的1940年初, 英法发表了无法履约的声明。此后, 英苏鼓动土耳其参战, 土方则始终摇摆不定, 直到1944年8月苏军进入保加利亚、切断土耳其与轴心国的陆地联系, 土方才与德国断交, 随后于1945年2月对德宣战。

第二, 加强在地中海东部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尽管在其他战区面临巨大的压力, 丘吉尔依然拒绝了英国海军部有关放弃东地中海、集中固守直布罗陀的主张, 并于1940年7月3日下令舰队仍然留驻东地中海。在同年8月15日即戈林下令空袭英伦的当天, 英国内阁决定派遣一个装甲旅去中东, 这在当时占英国最好的装甲力量的一半。此后, 英国在地中海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外交行动: 攻击和俘获了维希法国海军的多艘舰只; 动用英国在地中海全部的海空力量与占优势的意大利海军较量, 到年底意大利损失16.7万吨商船, 英国得以维持了地中海航线的安全; 以经济手段迫使西班牙和维希法国保持中立, 既承认“自由法国”又与贝当政府保持联系; 在希腊和利比亚对意大利陆海军的成功反击^{[22]80-82}。

第三, 彻底改变对犹太人移民的态度。1939年初, 英国与巴勒斯坦阿、犹双方召开圆桌会议, 依然无果而终。当年5月, 英国发表了白皮书, 彻底改变对犹太移民的态度, 犹太人举行了总罢工与示威游行, 但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号召犹太人“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 与大英帝国并肩作战”, 以打败纳粹德国。英国则在地中海东部部署军舰拦截从欧洲偷运犹太移民来巴勒斯坦的船只, 直到1944年才同意犹太社团组织犹太旅, 参加英军作战。

第四, 镇压伊拉克的“金四方”运动。英国决心以武力重建其在伊拉克的地位。1941年4月16日, 英国大使把英军即将在巴士拉登陆一事通知伊拉克政府。拉希德(Rashid Ali al-Gaylani) 首相在“金四方”(4位民族主义的校级军官) 的坚持下提出了四项限制条件。29日, 大批英军在巴士拉登陆, 30天战争开始。拉希德向全国发表抵抗声明, 侯赛尼则宣布开始圣战。巴格达坚信伊军可以抵挡3个月, 之后轴心国军队将赶来援助。事实上, 由于德国正准备进攻苏联, 直到5月13日才经叙利亚向伊运来第一批军火, 从叙利亚机场起飞的德国飞机也对英军机场进行了轰炸。但这些援助无济于事, 英国和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迅速击溃了装备低劣的伊军, 于5月底进入巴格达。此次仓促进行的反英起义宣告失败。

第五, 消灭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维希政权。1941年6月初, 英军^②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军队进入叙

① 黄民兴《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东民族主义的发展》, 载《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第2-3页。有关一些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德意法西斯的态度及后者对民族主义的看法, 参见 Simon Davis, “The Middle East and World War II”, in Thomas W. Zeiler, with Daniel M. DuBois eds. *A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vol. I, Wiley-Blackwell 2013, p. 280; Mia Lee, “Nazis in the Middle East: Assessing Links between Nazism and Islam”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vol. 27, no. 1, 2018.

② 参与行动的包括澳大利亚军队和英印军队。参见“Middle East 1930-1947: Syria 1941-1945”, British Military History, <https://www.britishmilitaryhistory.co.uk/docs-middle-east-1930-1947-syria-1941-1945/>. 点击时间: 2025-04-06。

黎境内。7 月中旬,盟军几乎控制了叙黎全境。1943 年,民族联盟在叙利亚大选中获胜,该党随后展开了反对法国驻军、争取完全独立的斗争。同年 11 月,法军总司令宣布黎巴嫩独立,但法国仍企图维持自身的特殊地位。在 1943 年 9 月举行的黎巴嫩总统选举中,基督教和穆斯林民族主义力量联合起来,终于挫败亲法的埃迪(Émile Eddé),民族主义者胡里(Bechara el-Khoury)再次当选总统。

第六 英苏出兵伊朗,警告阿富汗。1941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6 日,英苏两次照会伊朗政府,要求驱逐在伊朗的德国非外交人员,遭到伊朗政府拒绝。8 月 25 日,英苏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入侵伊朗。9 月 10 日,英苏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关闭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使馆。9 月 16 日,礼萨汗宣布退位,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继位。17 日,英苏军队进入德黑兰,逮捕了所有德国人。10 月 17 日和 19 日,英苏分别要求阿富汗在一个月内驱逐德意所有非外交人员。阿富汗政府转而命令所有交战国的非外交人员离境,同时要求英苏保障轴心国侨民安全通过并准其携带个人财产。11 月中旬,阿富汗的德意侨民全部离境。1942 年 1 月,伊朗与英苏签订同盟条约,条约规定盟国有权“在伊朗领土上驻扎它们所认为必需数量的陆、海、空军”。此后,美国在德黑兰设立驻波斯湾司令部,派来 3 万名非战斗人员参与扩建和改造伊朗的基础设施。美国还派出财政专家使团、军事顾问团及宪兵代表团帮助伊朗有关部门的工作。

第七 促成华夫脱党在埃及执政。埃及是盟军在中东的战略中心,英国中东司令部、英国常驻中东国务大臣官邸均设在开罗。英国还于 1941 年 4 月在开罗设立中东补给中心。因此,保障埃及的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由于对埃及高官的亲德倾向不满,1942 年 2 月,英国以退位要胁埃及国王任命华夫脱党的纳哈斯(Mostafa al-Nahas)再度出任首相,并出动装备了坦克和大炮的英军包围王宫,国王不得不屈服^[24]270-271。

总之,虽然大战期间中东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事,但局势依然紧张。1941 年 4 月至 10 月,短短 6 个月时间里,英国在苏联和“自由法国”的配合下先后消除了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伊朗和阿富汗的动荡因素,实现了地区稳定,确保了其他战场军事行动的顺利推进。

(四) 中东对二战的贡献

第一,开辟了通过伊朗援助苏联的大通道。苏德战争开始后,苏联损失了大量军事物资,亟需外援。苏联于 1941 年 6 月末提出利用波斯湾—伊朗通道运送盟国援苏物资的建议,1942 年 6 月美苏正式签署援助协定。美国援苏的主要路线及其占援助总量的比重分别为北冰洋航线(22.7%)、黑海航线(启用最晚,占 3.9%)、太平洋航线(47.1%)、北极航线(2.5%)、伊朗航线(23.8%)^①。以上航线中,伊朗航线是最安全的路线之一,但也是最长的路线,转运时间长达 75 天^[25]。主要困难是波斯湾港口及伊朗境内交通设施的老旧,运力很低;运输船队司机短缺;船只运输常遭到德军飞机的攻击。为提高运力,苏、英、美和伊朗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对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航线的运作时间为 1941 年 11 月到 1944 年 12 月,共运输 416 万吨货物^②,运输的物资包括飞机、汽车、摩托车、拖拉机、弹药和其他爆炸物、食品、金属制品、石油、道路设备、地雷和其他货物。伊朗也提供了约 50 万吨石油制品^[26]。

第二,为盟国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协调中心和物资补给中心。苏德战争爆发后,中东进一步成为连接英美苏三大盟国的纽带与东西方盟国之间进行战略协调、联合作战、军事调遣、人员交流和物资补给的中心。其中,中东补给中心的成立是为了在物资上增援在北非与轴心国作战的英军,同时保持对中东国

① 百分比为作者计算。见 John Curatola, “Lend-Lease to the Eastern Front”, the National WWII Museum, July 29, 2024, <https://www.nationalww2museum.org/war/articles/lend-lease-eastern-front>.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神话》,莫斯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25 页。转引自郭洋汛《二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海上援助》,黑龙江大学 2023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36 页。另有研究认为,截至 1944 年 12 月,共运输货物 500 万吨。见冀开运《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90 页。

家经济必不可少的民用物资供应,并对设备陈旧的中东港口进行维修。补给中心的主要任务是为中东各地区分配可供使用的船舶;确定进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审查并批准进口许可证;决定应从哪些国家进口货物;保留满足中东对短缺的以及配给的物品和货物的最低需求;在中东维持小麦及其他大宗货物的共同储备,以供紧急时期之用。1942年当美国根据租借法提供的援助物资调往中东以后,美国官员也参加了补给中心开罗总部的指导性工作。此后,英美矛盾日趋尖锐。1945年,美国的退出宣告了补给中心业务的结束^{[27]249-282}。另外,埃及是盟国在中东重要的战略协调中心。约有50多万英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波兰、希腊、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美国士兵通过埃及奔赴各个战场^{[28]125}。

第三,为盟国召开首脑会议提供了关键场所。首先是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26日召开,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签署了《开罗宣言》。宣言声明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将坚持对日本作战,直到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其次是德黑兰会议,于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召开,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人参加。会议通过了三国在对德国作战中一致行动和战后合作的宣言。会议拟订的对德作战计划,对欧洲战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决胜性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会议有关战后重建世界和平的设想,为联合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此外,1945年2月在苏联黑海沿岸的雅尔塔召开的雅尔塔会议,距离土耳其不远,稳定的中东为会议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安全保障。

第四,中东国家成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成员。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表示赞成《大西洋宪章》,并决心共同战胜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绝不与敌国单独议和。此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截至1945年5月1日,声明加入《联合国家宣言》的中东国家有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黎巴嫩。

最后,为盟国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物资,包括石油和各种农产品、其他物资。事实上,战争造成的贸易中断、支援战争及盟国对物资流通和商业活动的控制,造成了地区物资供应紧张和通货膨胀,严重影响地区民生。如伊朗在英苏伊三国协定签署后便处于一种“非正式占领的状态”中,这种特殊状态对伊朗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南北两部分无法实现物资的自由流通,三国驻伊人员占用大量物资,伊朗国民的面包、肉类及其他主食供应则极为短缺^{[26]149}。因此,中东国家的人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五) 二战对中东的影响

第一,进一步提高了中东的国际战略地位。18世纪末拿破仑进军埃及时,首次赋予中东以欧洲“侧翼”的战略意义,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任何一个强国要在欧洲取得支配地位,都要全力去控制近中东地区。而二战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提高了中东的战略地位。首先,新式军舰、飞机和坦克投入实战,使各国军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强,因此控制连接三洲五海的中东的地缘价值增加了。其次,现代军事装备使各国对燃料的需求急剧增加,而中东作为世界的重要石油储藏地区,成为未来世界大战中的必争之地。二战期间轴心国妄图在中东的心脏地带实现大会师的计划,充分说明了中东的战略意义。这样,中东便首次在世界规模的冲突中成为双方争夺的“要冲”,而不再仅仅是欧洲战场的“侧翼”^[29]。

第二,推动了中东民族主义的发展。两次大战之间和二战期间(在盟国的配合下),英法(“自由法国”)通过两手措施,即通过对温和派民族主义让权及压制激进派民族主义逐步实现了中东地区局势的稳定,保证了两国殖民体系的安全,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夺取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然而,殖民统治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即彻底的独立和发展。英法两国都采取各种措施在“独立”后的委任统治地与埃及保留各种特权和影响,二战期间“自由法国”在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后的所作所为是最突出的表现。必须指出,一战后英法对中东民族主义的镇压、背叛和分化利用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心中留下了巨大的伤痛。尽管温和派民族主义与英法达成了妥协,满足于远非完善的国家独立和徒有其名的议会民主,但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纳赛尔为代表的激进派民族主义决心继续斗争,为阿拉

伯地区的统一、真正的独立和深入的社会改革而努力。

第三,加速了英法殖民体系的崩溃。不同于一战主要限于欧洲战场和中东战场,二战的战火波及北非、东非、东亚和东南亚,英法在上述地区的殖民地均卷入了反法西斯战争。大战以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宣告结束,而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战后亚非各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使英法殖民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帝国大厦摇摇欲坠。在中东,1946 年法国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军意味着两国的彻底独立和法国在中东殖民体系的终结,而 1956 年埃及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炮火则给英国在中东的殖民体系敲响了第一声丧钟^①。

第四,促成了美苏主导世界和地区秩序。二战期间美苏英三国首脑推动形成了以《雅尔塔协定》为标志的战后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即“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东西方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东亚达成了划分战败国领土和势力范围的协议,建立了稳定的东西方阵营。而其他亚非拉地区不在雅尔塔体系范围内,尤其是中东,它是唯一与苏联接壤的由非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地区,因此,苏联与中东毗邻的南翼成为它脆弱的“下腹部”,这是二战后苏联很快就向土耳其和伊朗提出领土、石油诉求并干涉当地少数民族事务的主要原因。而美国在大战期间也积极在伊朗展开活动,二战后的杜鲁门主义针对的正是希腊与土耳其面临的苏联“干预”。可以说,中东是冷战开启的地区^[30]。

第五,推进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建立。为维持自己在战后阿拉伯地区的影响,1941 年 5 月,英国外交大臣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首次发表支持阿拉伯国家成立联盟的倡议,此时正值北非战场德意军队攻至埃及边境之际,战争态势尚不明朗,因此阿拉伯国家未予回应。1943 年 5 月,艾登旧话重提。在此前后,阿拉伯国家多方提出方案,包括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的以“大叙利亚”为基础、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主组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方案(1942 年)、外约旦以叙利亚和伊拉克组成的阿拉伯联邦为基础的方案(1943 年)。沙特大臣则于 1941 年 8 月呼吁英国政府推动阿盟成立计划。1943 年 5 月,埃及表示愿意邀请阿拉伯各国政府代表举行会议,达成有效协议。1944 年 10 月,阿盟筹备委员会通过《亚历山大议定书》,与会各方同意所有成员国以独立国家身份加入阿盟,在理事会中地位平等,致力于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合作。1945 年 3 月,有关国家正式签署《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阿盟从此建立^[31]。考虑到二战的战火并未真正波及中东地区,我们可以把阿盟成立的时间(1945 年 3 月)视为二战在中东结束、同时开启中东当代史的节点。

四、结论:1918—1945 年英法殖民统治的影响

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中东为何在二战期间能基本上保持“和平”——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如前所述,大战期间中东的稳定并不意味着矛盾的消失。随着二战的结束,英法在中东的殖民体系终于开始走向解体。然而,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是英法殖民统治在中东留下的负面遗产,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一战后英法处理其中东殖民地的方式。因此,两国根据自身的利益肆意设立委任统治地、随意划分有关国家的领土、用分而治之的手法进行统治等,在中东遗留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对当代中东民族国家的构建产生了深远而恶劣的影响。正如尤金·罗根(Eugene L. Rogan)所说:一次大战后“解决方案所制造的全新阿拉伯国家及其边界体系表现出惊人的持久性,其一手制造的问题也同样如此”^{[3]208}。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巴勒斯坦问题。尽管 1939 年白皮书标志着委任统治当局政策的改变,但木已成舟。此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成员的数量和组织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and 水平,它们获得美国、法国等西

① 李秉忠认为“事实上,英国从未离开中东,它顺利地与美国完成了在中东的权力交接,美国对英帝国遗产的继承赋予英帝国遗产全新的生命力和新的特征。”见李秉忠《英帝国遗产和中东治理的困局》,载《土耳其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17 页。

方国家的支持,大战期间继续从欧洲向巴勒斯坦偷运犹太移民,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极端手段向委任统治当局施压,迫使英国在二战后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其结果就是,1948年委任统治结束后单方面建立了以色列国,阿以冲突从此开启。

其实,在圣雷莫会议结束后制定委任统治条款的日子里,英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在巴勒斯坦安置一个犹太人家园是英国的麻烦。寇松对贝尔福说出了外交部里很多人的心思:“从我个人来讲,我敢确定,谁托管了巴勒斯坦,它就是谁的心头刺。趁现在还能抽身,我们要赶紧撤。”英国人也压低了托管的调子,暗示犹太民族之家只是位于巴勒斯坦内部,而不等于是整个巴勒斯坦。他们不再提托管国发展自治共和国的职责,而是改用“自治机构”来替代^{[1]586-587}。这就是手腕“高超”的英国人的杰作,甚至当时法国人也没有料到,他们认为不可能有人会蠢到挑起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2]40}。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黎巴嫩。法国人把叙利亚的土地割给黎巴嫩,使后者接纳了大批穆斯林,从而面临着尖锐的矛盾。在独立30多年后的1975年,黎巴嫩爆发了内战。“外界对此非常吃惊,但当地人都知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1]561}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建立由巴格达、巴士拉和摩苏尔三个省组合而成的伊拉克国家(甚至它的国旗、宫廷礼仪和加冕礼及费萨尔国王的服装都是英国顾问设计的)^①,挑动海湾酋长国与伊朗的领土纷争及伊拉克与科威特的领土纠纷^{[32]54-55}。

委任统治的建立使阿拉伯人建立统一国家的梦想归于破灭,奥斯曼帝国的广阔土地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委任统治地。欧洲列强签订《色佛尔条约》的房间布置似乎已经暗示了这个条约的最终命运。“条约是在巴黎市郊色佛尔的一个瓷器厂的陈列室签署的,这里只有易碎的摆设。”^{[1]619}《色佛尔条约》的签字早已黯淡难辨,但委任统治形成的边界却定格在中东大片的沙漠、丛山和田野间,殖民主义欠下的累累债务也永远铭刻在阿拉伯人民的心里。

参考文献

- [1]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缔造和平: 1919 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M]. 邓峰,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8.
- [2] 詹姆斯·巴尔. 瓜分沙洲: 英国、法国与塑造中东的斗争[M]. 徐臻,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3] 尤金·罗根.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 1516 年至今[M]. 廉超群,李海鹏,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
- [4] 王铁铮. 中东国家通史·约旦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5] 王三义. 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研究[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 [6] 约翰·罗伯逊. 辉煌与苦难: 伊拉克 6000 年[M]. 刘胜,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4.
- [7] 黄民兴. 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8] 黄民兴,张娟娟. 试析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J]. 世界民族, 2022(2): 13-24.
- [9] 彭树智. 阿拉伯国家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10] 西·内·费希尔. 中东史(下册)[M]. 姚梓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11] AL-ENAZY, Askar H. The Creation of Saudi Arabia: Ibn Saud and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1914—1927[M]. Abingdon: Routledge, 2010.
- [12] GIL-HAR Y. Delimitation Boundaries: Trans-Jordan and Saudi Arabia[M].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92.
- [13] 赵娜. 法国委任统治与亚历山大勒塔问题的由来[J]. 世界历史, 2021(5): 96-110, 163.
- [14] 杨辉. 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5] 艾兰·佩普. 现代巴勒斯坦史[M]. 2 版. 王健,秦颖,罗锐,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16] 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 劳伦斯·戴维森. 中东史[M]. 8 版. 哈全安,刘志华,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① 尤金·罗根就黎巴嫩的国旗讽刺说“法国让独立的黎巴嫩升起的第一面国旗却是一面中间绘有一棵雪杉树的法国三色旗。”见尤金·罗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 1516 年至今》,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81 页。

- [17] 郭宝华. 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8] 王铁铮. 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9] 钟志成. 中东国家通史·海湾五国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20] NASR S H. Traditional Islam In The Modern World[M]. London &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7.
- [21] 谢志恒. 立宪君主制时期埃及宗教政治认同复兴的原因探析[J]. 外国问题研究 2016(3) : 29-40 ,118.
- [22] 夏正伟. 英国在地中海与德意的抗争(1940 年 6 月—1941 年 6 月) [J]. 军事历史研究 ,1995(4) : 77-82.
- [23] 王新刚. 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24] 雷钰 苏瑞林. 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25] 孙向宇. 二战中伊朗航线与库尔德问题[J]. 西伯利亚研究 2016(3) : 81-84.
- [26] 马德义. 二战期间围绕波斯湾走廊援苏物资运输通道的国际合作[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21(5) : 131-154 ,158.
- [27] 乔治·柯克. 战时中东[M].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 [28] 彭树智. 二十世纪中东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 [29] 潘光. 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影响[J]. 西亚非洲 ,1990(4) : 57-63 ,43-80.
- [30] 黄民兴. 试析冷战在中东的分期和特点[J]. 史学集刊 2011(3) : 40-45.
- [31] 何志龙 黄心怡. 英国中东战略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立[J]. 世界民族 2024(2) : 88-101.
- [32] 田文林. 英国在中东的“分而治之”政策及其后果[J]. 西亚非洲 2020(3) : 46-68.

[责任编辑 樊丹丹]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Versailles – Sevres System: The Game between the Nationalism of the Middle East and British and French Colonialism , 1915—1945

HUANG Min-xing , WANG Zhi-yuan

(School of Country and Regional Studies , Northwest University , Xi' an 710127 , China)

Abstract: The Middle East was located between the two major battlefields of Europe and Asia , which were ravaged by war during World War II , but it has basically maintained “peace” with only relatively minor turbulence. Its root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olonial rule of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World War I. During World War I , countries such as Britain and France began planning to divide the terri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 which went through six main stages. Eventually , Britain and France established the “Versailles-Sevres system” as the basis for their mandate rul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ationalist uprising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Middle East after World War I , Britain and France took targeted measures based on the three major types of colonies and semi-colonies. The first type is the mandated territories and Egypt , which went through a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onstitutionalism , signing treaties with the suzerain state , joining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independence. The second category is Palestine , where the continuous influx of Jewish immigrants led to periodic violent conflicts with Arabs and failed arbitrations by the mandated authorities. The third category includes some semi-colonial and independent countries ,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rn Tier and the Arabian Peninsula. During World War II , Britain , the US , the USSR and the “Free France” took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First , to consolidate relations with Türkiye. Secondly , to strengthen military deployment and operation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hirdly , to completely change the attitude towards Jewish immigration. Fourth , to suppress the “Golden Square” movement in Iraq. Fifth , to eliminate the Vichy regime in Syria and Lebanon. Sixth , to send joint troops to Iran and warn Afghanistan. Seventh , to facilitate the defection of the Wafd Party from power in Egypt. Although the Middle East basically maintained “peace” during the war ,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Britain and France was not fundamentally resolved , and the British and French colonial systems finally collapsed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Key words: Versailles-Sevres system; World War I; World War II; colonialism; Middle East; nationalism